

从书斋命名看士大夫对陶渊明的接受^{*}

滑红彬 刘佳佳

(九江学院图书馆 江西九江 332005)

摘要:陶渊明业已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符号,对传统文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,本文试从书斋命名的角度揭示士大夫对陶渊明的认同和接受,论述陶渊明对书斋文化的影响及其文化意义。

关键词:陶渊明 斋号 书斋文化 接受史

中图分类号:I 207.2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4580(2014)03-0014-(04)

陶渊明不仅以文学著称,他的形象和思想业已浸染到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,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符号。陶渊明作为士大夫的精神归宿,对书斋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对于士大夫来说,书斋不单是藏书、读书、著书的具体处所,更是寄托怀抱、安顿心灵的一方天地。可以说,斋号是士大夫心灵的独白,不仅能表露其情趣志向,甚而透出其心灵最深处埋藏的情愫,因此,士大夫对于陶渊明的认同和接受往往能够通过斋号得到体现。

一、对陶渊明清高人格的仰慕

陶渊明清峻高洁的人格魅力千百年来一直都赢得后世的仰慕,萧统称赞其:“贞志不休,安道苦节,不以躬耕为耻,不以无财为病,自非大贤笃志,与道污隆,孰能如此者乎!”并认为陶作有强烈的净化人格的魅力:“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,驰竞之情遣,鄙吝之意祛,贪夫可以廉,懦夫可以立。岂止仁义可蹈,爵禄可辞!不劳复傍游太华,远求柱史,此亦有助于风教尔。”^[1]受陶渊明人格魅力之熏染者代不乏人,有的士大夫更是以陶名斋,托物言志,以示对陶渊明的仰慕和追随。

元代文学家虞集“早岁与弟槃辟书舍为二室,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,题曰‘陶庵’,右室书邵尧夫诗,题曰‘邵庵’。”^[2]

明代归有光亦步武虞集,以陶庵名其书斋。归有光《陶庵记》云:“已而观陶子之集,则其平淡冲和,潇洒脱落,悠然势分之外,非独不困于穷,而直以穷为娱。百世之下,讽咏其词,融融然尘查俗垢与之俱化。信乎古之善处穷者也。推陶子之道,可以进于孔氏之门。而世之论者,徒以元熙易代之间,谓为大节,而不究其安命乐天之实。夫穷苦迫于外,饥寒慙于肤,而性情不挠,则于晋、宋间,真如蚍蜉聚散耳。昔虞伯生慕陶,而并诸邵子之间。予不敢望于邵而独喜陶也,予又今之穷者,扁其室曰陶庵云。”^[3]归有光读陶集而心生敬仰,喜陶效陶,正是被陶渊明的人格魅力所感染,萧统言陶集“有助于风教”可谓真实不虚。

以陶名斋者还有很多,仅在清代,以“陶庵”命名者就有陈星、金世章、曹续祖、李泮、倪馥等,以“陶庐”命名者有法式善、王树枏、金武祥等,还有李钟麟“陶轩”、张诩“陶圃”、罗信南“陶龕”、蒋耕堂“慕陶庐”等等。

在众多以陶名斋的士人中,有几位藏书家需要格外注目。顾湄,字伊人,江苏太仓人,其藏书楼名曰“陶庐”。钱谦益《陶庐记》:“顾子伊人得宋刻苏长公书《陶渊明集》,藏弄斋中,晨夕吟讽,名其处曰‘陶庐’。”^[4]周春字菴兮,号松霭,海宁人,其藏书楼迭称礼陶斋、宝陶斋、梦陶斋。

*基金项目:本文系九江学院校级科研项目“九江藏书文化研究”(编号2013SK28)的成果之一。

收稿日期:2014-05-16

作者简介:滑红彬(1983-),男,九江学院图书馆馆员,研究方向为地方文献、藏书文化。

黄丕烈题跋记载：“汤注陶诗，宋刻真本，松霭与宋刻《礼书》并储一室，颜之曰‘礼陶斋’。其书秘不示人，欲以殉葬。贾人吴东白谈及周公先去《礼书》，改颜其室曰‘宝陶斋’，今又售去，改颜其室曰‘梦陶斋’。并闻他估云，周去书之日，泣数行下。”^[5]而黄丕烈本人亦有藏书楼曰“陶陶室”。黄丕烈，字绍武，号尧圃，江苏吴县人，著名藏书家。王芑孙《黄尧圃陶陶室记》云：“同年黄尧圃，得虞山毛氏藏北宋本《陶诗》，继又得南宋本汤氏注《陶诗》，不胜喜，名其居曰‘陶陶室’。”顾湄、周春、黄丕烈诸人对于《陶渊明集》的这种喜爱固然是出于重宋版书的缘故，但宋版书亦夥，而独拳拳于此者，乃是为陶渊明的人格魅力所感染。正如王芑孙所说：“今者托趣于陶陶，非独喜其宋本之不一而足也，盖尧圃宜为县而不为，略似陶公；其力耕校者，又大致仿佛，故因以自寓焉！”^[6]

二、对陶渊明回归主题的共鸣

中国士大夫总是在用舍行藏之间徘徊，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道出了士大夫普遍的境遇和内心世界。当士大夫在仕途上遭遇坎坷后，便会想到归隐，回归出仕之前的状态，也就自然而然地对陶渊明“归园田居”的生活方式产生共鸣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不仅仅是生活意义上的远离尘嚣、躬耕田园，还包含回归自我、回归人的自然本性的哲理意味，因此，陶渊明能够成为失意士大夫追寻人生价值、求得内心平衡的精神支柱。

《归去来兮辞》是集中表现陶渊明回归主题的名篇，特别是经过苏轼的追和之后，更是得到普遍的认同，也成为文人学士为书斋命名的典故渊薮，用以寄托胸襟。

苏轼早年在政治上奋发进取，勇于建言，后遭乌台诗案，被贬黄州，对于陶渊明有了深刻的认同，将陶渊明作为自己贬谪生活中的精神支柱。《东坡志林》卷一：“陶靖节云：‘倚南窗以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。’故常欲作小轩，以‘容安’名之。”^[7]黄仲元亦云：“坡老和翁四言、五言，风味大略相似，及和翁辞，自许为翁后身，毕竟道著翁意落在何处。后来坡以寄傲为轩。翁千载人，坡亦百世士也。”^[8]“容安”、“寄傲”均典出《归去来兮辞》之“倚南窗以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”。苏轼以此名轩，是对陶渊明归园田居的共鸣，也是自我胸襟的抒发，对后人，特别是对两宋党争

中被贬谪者产生了极大地影响。

苏门弟子晁无咎在绍圣年间屡遭贬谪，备尝党争之苦，并从崇宁二年（1103）蛰伏故里八年之久。闲居中，他于东皋经营田园，摭《归去来兮辞》中语以名其居，有“松菊堂”、“舒啸轩”、“临赋亭”、“遐观楼”、“寄傲庵”之称，并自号归来子，希冀以此保持心理上的平衡，求得心灵慰藉。

至大观元年（1107），又有赵挺之在党争中失势身亡，其子赵明诚因官秩被夺，遂偕妻李清照屏居乡里十年，聚书校讎，把玩金石。李清照父家及夫家均在党争中得罪罹祸，因此她以“归来”名其书堂，并自号易安居士，显示出她对陶渊明远离尘嚣、回归自然的认同，甘心悠游岁月，老于书林，以排遣党争带来的沉重情累。

此外，唐庚“寄傲斋”、张祁“归去来堂”等也都是借陶来排遣“朋党之争”中畏祸的情累，自我镇定，追求个体自由与生命价值。对于宦海浮沉的士大夫来说，陶渊明不仅仅是清峻人格的文化符号，更是文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，是在逆境中保持自我的精神支柱。

后世以《归去来兮辞》命名书斋者亦复不少，如元代危公镇“寄傲轩”、刘仲泽“审安斋”、明代文嘉“归来堂”、叶树廉“归来草堂”、清代戴澍巾“归来居”、陈醇“归来草堂”、沈赤然“寄傲轩”等等。但与宋代党争旋涡中的士人不同，他们没有身负“朋党之恶”的畏祸情累，更多的是抒发远离尘嚣、回归自我的清雅之念。

三、对陶渊明固穷安贫的认同

固穷安贫是指一个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道德原则。陶渊明“不以躬耕为耻，不以无财为病”，能够抵制利禄的诱惑，在贫困中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，并能在贫穷中体味人生，获得心理的平静和精神的高洁，成为千古传诵的楷模。同时，陶渊明将固穷和安贫的思想化为诗文，开创了诗歌中大量描写固穷安贫主题的先例。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，陶渊明都成为士大夫“穷则独善其身”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。

清代文学家姚鼐的书斋名“惜抱轩”，典出陶渊明《饮酒》：“若不委穷达，素抱深可惜。”意谓矢志勿移，不为穷达动摇其心。

倡导“诗届革命”的黄遵宪，著有《人境庐诗草》。“人境庐”取典于陶渊明《饮酒》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”黄遵宪学博才高，然而屡

困场屋，久试不第。其书斋原名“在勤堂”，黄遵宪改称为“人境庐”，表明他对陶渊明固穷安贫的认同。

近代大学者黄侃执教南京中央大学，筑“量守庐”，读书其中。“量守”取自陶渊明《咏贫士》“量力守故辙，岂不饥与寒”之句，意谓量力而守法度。章太炎《量守庐记》：“寡得以自多，妄下笔以自伐；持之鲜故，言之不足以通大理；雷同为怪，以炫于横舍之间，以窃明星之号，此非吾季刚所不能也。……夫季刚之不为，则诚不欲以此乱真诬善，且逮于充塞仁义而不救也。”^[9]可见黄侃要以“量力守故辙”表明其不趋时、不求新的严谨学风和固穷安贫的学术追求。

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诗有“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”之句，“守拙”意谓保持自身淳朴之本性，而不同流合污。陶渊明“守拙”之说对后世影响甚大，以此名斋者甚多，几乎成为认同陶渊明固穷安贫思想的代名词。在清代，“守拙斋”、“守拙轩”、“守拙堂”、“守拙山房”、“守拙庐”等多达数十家，如吴昌硕之书斋即名“守拙斋”。吴昌硕曾做安东令月余，故制“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”印，另有“喜陶之印”等，他对于陶渊明当别有兴会。

四、对陶渊明生活旨趣的向往

陶诗的美在于自然，他的诗与生活融为一体，随其所见，指点成诗，率真自然，具有一种特别感人的力量。正如袁行霈所说：“他似乎无意写诗，只是从生活中领悟到一点道理，产生了一种感情，蕴涵在心灵深处，一旦受到外力的诱发（如一片风景，一节古书，一件时事），便采取了诗的形式，像泉水一样流溢出来。”^[10]因此，生活中的细微感受和寻常片段，一经陶诗道出，便产生一种独特的韵致，为后世文人所称赏和向往。

陶渊明“少学琴书，偶爱闲静，开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”^[11]，并将读书生活的乐趣写入诗中，“孟夏草木长”一诗是他写读书之乐的名篇，令后世文人向往不已。诗中“众鸟欣有托，吾亦爱吾庐”，物我情融，最见陶渊明特有之意境，甚得后人共鸣。清代崇恩有“吾亦爱吾庐”，藏图书碑帖甚富。张曾裕、吕世宜、吴鳌、陈纶等人也均以“爱吾庐”作为书斋名。另外，清代汪日桂之藏书楼名“欣托斋”，亦源于此句。

诗中“既耕亦已种，时还读我书”之句写耕读生活，自然淡雅，亦深得后人追随。清代华长

卿即以“时还读我书屋”名其书斋，此外尚有曾对颜“还读我书室”、钟元赞“还读我书斋”、葛奎“还读书斋”、韩崱“还读斋”、周孝燠“还读庐”、陈宝箴“还读楼”等，不一而足。

《赠羊长史》中“得知千载外，正赖古人书”句亦涉及读书生活，表达其怀古之情。清人周亮工即以“赖古堂”为书斋名，周亮工又号“陶庵”，并刻“学陶”印，对陶渊明景仰之至。

“停云”、“东轩”也是陶渊明创造的独特意向。“停云”隐喻思念亲友，辛弃疾在铅山有“停云堂”；文徵明名其居所曰“停云馆”，并刻有“停云”“停云生”印。清代李家瑞书斋名“停云阁”。“东轩”在陶诗中数见，《饮酒》即曰：“啸傲东轩下，聊复得此生。”因此东轩成为高洁闲适、遗世自得的象征，如清代藏书家郁礼有“东啸轩”、查善和有“东轩”等等。凡是这些生活中最平常的事物，经陶渊明笔触点染，就给人以极平淡又极生趣的意境，言浅意永，发人深思。

明代张奇龄创“涉园”以藏书，卷帙甚富，其林泉之胜，甲于东南，后传至其裔孙张元济，绵延三百年。张元济为中国近现代著名出版家、文献学家，校勘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，主持影印《四部丛刊》，嘉惠学林。“涉园”本于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“日涉园以成趣”之句，以示淡泊自洁、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。近代藏书家陶湘之藏书楼亦名“涉园”。

以陶名斋与和陶诗、集陶诗一样，都是借文人雅事表达士大夫对清高人格的向往，对保持个体自然性情的追求。和陶诗、集陶诗是在文学创作上表达其对陶渊明的接受，而以陶名斋则是在文人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对陶渊明的认同，它们从不同维度诠释着陶渊明对传统文化产生的既广且深的影响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龚斌. 陶渊明集校笺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1. 496.
- [2] (明) 宋濂. 元史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6. 4181.
- [3] (明) 归有光. 震川先生集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7. 426.
- [4] (清) 钱谦益. 钱牧斋全集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3. 1009.
- [5] (清) 黄丕烈. 士礼居藏书题跋记[M]. 北

京: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9.185.

- [6]李希泌、张椒华.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2.53.
- [7](宋)苏轼.东坡志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79.
- [8]李修生.全元文(八)[M]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8.365.
- [9]程千帆、唐文.量守庐记学记[M].北京:三

联书店,2006.5.

- [10]袁行霈.陶渊明研究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9.61.
- [11]龚斌.陶渊明集校笺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.466.

(责任编辑 秦川)

(上接第13页)

三、小结

就诗歌文人化的历史发展来看,人们对陶诗在诗歌题材、艺术风格方面的贡献作了充分的分析探讨,部分成果已经成为学界共识;但对陶渊明在诗歌叙事方面的研究则相对不够,对陶诗叙事性、叙事特征、叙事价值以及对后代文人叙事诗的影响方面的研究,仍值得大力挖掘,从而有助于全面评价陶诗的历史地位与贡献。正如笔者在本文开头用过的那个比喻一样,陶渊明是在叙事诗和抒情诗之间走平衡木,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实现了叙事与抒情的平衡,达到了情景交融,但要公正合理地评价陶诗地位,却不能执其一端,脱离诗中的叙事谈抒情,那就是“皮之不存、毛将焉附”的道理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[2][17][23](清)何文焕辑.历代诗话(上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4.267.
- [3]钟优民.世纪回眸——陶学的由来和走向[J].九江师专学报,1997(3):30.
- [4][9][10][11]孙康宜.抒情与描写——六朝诗歌概论[M].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06.2.
- [5]张可礼.东晋文艺综合研究[M].济南:山东大学出版社,2001.371.
- [6]董乃斌.古典诗词研究的叙事视角[J].文学评论,2010(1):26.

- [7]鲁迅.鲁迅全集(第6卷)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.430.
- [8]王夫之辑.清诗话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63.32.
- [12](日)吉川幸次郎著.章培恒译.中国诗史[M].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1.188.
- [13]李剑锋.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[M].济南:山东大学出版社,2005.134.
- [14]章培恒、骆玉明主编.中国文学史(上)[M].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1997.359.
- [15]辞海(第六版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10.2152.
- [16]王瑶.中古文学史论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8.372.
- [18]程相占.论先秦两汉民歌的叙事特征[J].学术月刊,1997(7):76.
- [19]王新霞.向日常生活的纵深开拓——浅议两晋诗歌的叙事艺术[J].名作欣赏,1998(3):105.
- [20]张可礼.东晋文艺综合研究[M].济南:山东大学出版社,2001.391.
- [21]王瑶.中古文学史论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8.366.
- [22]葛晓音.论汉魏五言的“古意”[J].北京大学学报(哲社版),2009(2):15.

(责任编辑 秦川)